誤解

言止善

誤解往往產生於有經驗的人，當他們的強勢地位固化了他們看問題的立場時，誤解容易被擴大，最終可能釀成悲劇。

小孫女一天天長大，我們這些圍着她轉的人也多少有了些經驗：如果她哭鬧起來，一般是兩個問題，或者是餓了，或者是犯睏了。於是，我們都要採取相應的辦法，盡量滿足她的要求。有一次，她大哭大鬧，我們把「法寶」都拿了出來，卻無一奏效。糟了，一定是生病了，不會講話的孩子身體不舒服，有口難言，多可憐。馬上，全家動員，急忙把她包裹起來，一行人匆匆下樓，準備打車上醫院。剛出房門，小傢伙就不哭了。下了樓，她就恢復了東張西望的常態——小腦袋靈活轉動，像跳探戈舞的一樣。五分鐘後，破涕爲笑。原來她只盼望出來看世界，我們竟不理解她的心理需求，大驚小怪純屬誤解。

這種小誤解，你也可能經常碰到，因爲是小事，無關大局。但國家之間，文化之間的誤解，確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法國漢學家魏柳南（Lioel Vairon），他在多個國際知名機構任職，日前他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就爲什麼會產生誤解有一番深入的分析。談到西藏，他說「我不知道是哪裡來的消息說法國人支持藏獨活動。」「當然也有幾百個法國人在街上遊行公開表示對藏獨的看法，但這不代表所有的法國人。」「法國人可能認為達賴喇嘛是一個好人——在法國人眼裡所有西藏人民都是信仰佛教的喇嘛，喇嘛和佛教都是代表着和平。他們沒有想到在西藏也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人，他們沒有看到事實上很多西藏人並不是喇嘛，西藏也有一些激進分子。」魏柳南畢竟是嚴肅的學者，他研究方方面面的材料，看問題的角度是不同流俗的。他還剖析了問題的癥結是「中西方或者說中法之間確實存在文化衝突，源於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互相不了解。」「西方人有強烈的優越感。」「我在法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人們都會告訴我說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人民沒有自由。其實這是對中國的誤傳，完全錯誤的認識。改革開放三十年給中國帶來了很多，雖然不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就像網上說的，進步很大。中國可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條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民主道路。」魏柳南認爲不同國家的人對民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法國人的看法和意大利人的看法就有很多不同。他還說：「中國要走民主道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現在中國沒有模式也沒有可以照搬的模式，各個方面只能自己摸索。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國。」爲了盡量減少誤會，他建議「西方和中國應該相互尊重，多交流。」

魏柳南的話，雖不是一首扣人心弦的詩，但的確給我們不少啓發：誤解可能產生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誤解可能經常發生，但並不可怕；法國人最好不要誤解中國人，中國人也最好不要誤解法國人；想要消除誤解，有個好辦法，就是「互相尊重，多交流」。

一個懵懵懂懂的嬰兒，你如果不尊重他（或她），小傢伙也有對付你的法子。「簡單的」腦袋裡的思維很可能已超出了我們這些「有識者」的想像，令我們誤解，誰都知道，這根本不是壞事。反之，如果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能逃脫我們的經驗，或者在我們的想像當中，那麼，作爲萬物之靈的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驚異，也不需要再學習什麼，即使活着，還有多少意思？

利息在人間

易俊傑

人與事

胡適曾傾其所有，慷慨資助過許多貧困的青年。學者陳之藩青年時，因無錢去美國留學，正在爲難，胡適聽說就給了他一張四百美元的支票資助他成行。後來，陳之藩有了錢，馬上就還給胡適，還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胡適接到信後，給陳之藩寫了這樣一封回信：

之藩兄：

謝謝你的來信和支票，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去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眞是金玉良言！胡適這話說得多麼好啊，又多麼深刻！他在這裡告訴我們：

因爲幫助別人，總有一種快樂盈滿心間，因此你將收穫快樂的利息；

因爲幫助別人，總有一種感恩寄存在別人的心田，因此你將收穫感恩的利息；

因爲幫助別人，總有一種善念以循環的形式出現，讓別人再去幫別人，因此你將收穫回報的利息。

眞是「一本萬利」：正如胡適所言。

一個人在世上能把私利看淡到如此境界，確實是很不容易的。陳之藩在後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我們讀了胡適這封信，是否也當有陳之藩這樣的感覺？

于丹「不差錢」

柳海林

如是我見

《于丹〈論語〉心得》英文版拍出了十萬英鎊的版權輸出紀錄。這一筆不菲版費羨煞不少碼字的人。于丹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寫書賺了稿費」不會改變她的生活，實際上她沒有寫書的時候，作爲大學老師的她「也沒缺過錢花」。

按照當下時髦的說法，于丹算是「不差錢」的人。在登上央視百家講壇一舉成名天下知之前，潛龍在淵的于丹也從沒有爲錢而發過愁，更不用「爲五斗米折腰」。于丹的大學教師職業，收入雖然不足以「發家致富」，但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還算綽綽有餘。

于丹的這種「不差錢」的生活，其實是芸芸衆生中絕大部分平民百姓的願望。他們中的不少人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爲錢所困，爲錢所愁，生活的滋潤感蕩然無存。

雖然于丹「不差錢」，但也並不意味着她是個有錢人。在北京這個富者雲集的大都會，有錢人比比皆是，于丹的那一丁點薪水與他們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相比那些聲色犬馬、揮金如土的富翁而言，「不差錢」的于丹的物質生活顯然難以與之相提並論，大概只是處在小富即安的層面，不過她對此頗爲心滿意足，還洋洋得意告訴記者她「沒缺過錢花」。

「不差錢」但「錢也不太多的」的于丹，簡簡單單、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她的一系列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居然是在聽老人孩子說說笑笑的時候，伏在客廳的餐桌上完成的。可見，她對生活的要求實在不高。

顯然，于丹「不差錢」的生活是建立在普通標準基礎之上，她的家庭生活開支量入爲出，雖不必像貧窮之家那樣太過節儉，也不會像富貴之家那樣鋪張，維持着一個城市平民的普普通通的生活。這樣收入剔除開支，有一點節餘，當然就「沒缺過錢花」了。如果要像一些人那樣過度消費，寅吃卯糧，當然會入不敷出了。

如今這個年代，「哭窮」的富人倒是層出不窮，而收入並不太多的于丹標榜她「沒缺過錢花」，是「不差錢」一族。這種萬象社會的不同人生態度，折射出截然不同的金錢觀。對於那些慾壑難塡的人來說，他們將人生的一切建立在金錢物質之上，爲金錢所役；而于丹超然於金錢物質之外，慾望不高，隨遇而安，知足常樂，生活雖不富貴，但活出自我，比那些所謂的有錢人活得開心幸福。

于丹的「不差錢」，更體現在她的精神層面的富有。實際上，致力於學術的于丹，生活的核心早已從物質昇華到精神層面。她在大學裡傳道授業教書育人，在央視百家講壇上爲國人解讀闡釋莊子孔子，啓發人生智慧，受到人們的喜歡敬重。或許，精神層面的富足，弱化了她對物質的追求，甚至對物質不屑一顧。

即使這次獲得國外不菲的版費，于丹也不會改變她固有的生活風貌，她已經習慣了這種簡單平淡的生活及其所帶來的快樂與滿足。錢對於她是身外之物，不會爲其所役，而是持着心平氣和的態度，等閒視之。

于丹的「不差錢」，其實是她以身引導主張的一種生活態度：在物質層面「不差錢」的同時，更要爭取人的精神領域「不差錢」，活出眞我風采。

「三災石」歙硯

陳 旻

文化經緯

十幾年前，家裡有兩方安徽親戚送的歙硯，當時不懂，總想隨手送人。可先後送了好幾個朋友，竟然都被認爲「沒什麼用處」而拒收，無奈之下，只好放在家裡閣樓上閒置着。近年中，歙硯成了收藏品，爲文人把玩、寄情抒懷之物。我在整理舊物時拿出來一看，竟然都是上乘的「老坑硯」，色黑泛青，一方泛着金暈，另一方漾着水波，我自然又驚又喜，大有「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感慨。

有着一千年歷史的歙硯主要是指產於婺源龍尾山之石所製之硯。龍尾山地處婺源縣東溪頭鄉硯山村，因婺源長期以來爲徽州管轄，而徽州又是在宋宣和三年由歙州而改，故稱歙硯。歙硯具有發墨不耗墨、貯水不吸水、潤筆不損筆的特點，爲歷代文人雅士所推崇。

出生於唐朝末年、經歷了五代、去世於宋太祖年間的文士陶谷曾寫歙硯爲「三災石」：「字札不奇，硯一災；文辭不美，硯二災；窗几狼藉，硯三災」，意爲文章不能寫得出奇的怎配得上這樣的佳硯，此爲一災；文字不美缺少文采，是爲二災；窗前書案雜亂爲硯之三災。足見古代文人之講究。南唐後主李煜稱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爲天下之冠。宋代大書畫家米芾在《硯史》一文中，對歙硯作了概括：「金星宋硯，其質堅麗，呵氣生雲，貯水不涸，墨水於紙，鮮艷奪目，數十年後，光澤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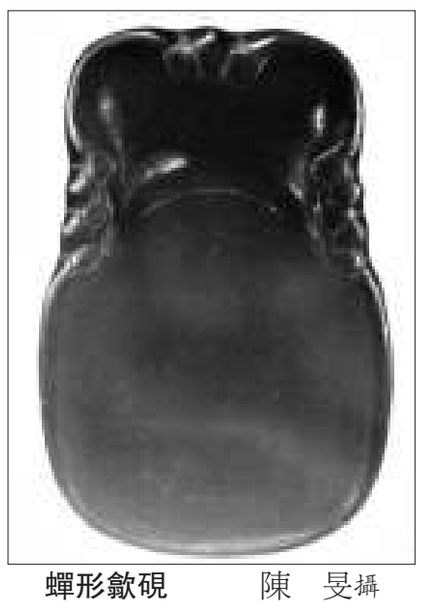
在黃山市的屯溪老街上，全長一點五公里的老街，賣硯的店舖一家挨着一家，有堂趣硯、三百硯齋、外婆家硯堂等，店舖內衆多的名硯琳琅滿目，一方方歙硯造型新穎、題材各異、構思巧妙、精雕細刻，大的如浴缸，小的如掌心。

去年逛老街，在一家店舖內，看見一塊足有近一米五見方的硯料墩實地放在一個大桌子上，硯料石質堅實細膩、硯面上油光可鑒，布滿水舷金紋。坐在一旁的男店主見我對這塊硯料看了又看，便引爲知己。他告訴我，這塊硯料是他在十五年前借錢買的，爲此，還和妻子大吵了一架。一旁的妻子聽着此話白了他一眼。男店主說，當年他是一眼看中這塊硯料的，十五年來，硯料的價格已經翻天覆地，這塊硯料曾有香港人出價數十萬，他都沒捨得賣，每天擦上核桃油悉心養護着。一空下來，他就面對着這塊硯料陷入遐想，十五年間，先後設計了無數個雕刻方案，甚至夜間做夢都在構思，但至今沒有特別理想的，所以一直不捨得動刀。說着說着，這個男店主索性將他構思的幾個待選方案一一道來，細細與我探討，雕羅漢、雕名勝風景、雕神話傳說，他對着硯料比劃着，說得激情四溢，我也聽得入迷。後來，每次去屯溪，我都會去他的店裡轉轉，那塊硯料還那麼放着，依然油光可鑒，細嫩若孩兒肌膚。男店主已記得我了，亦不再多語，只是會心一笑，邀我一同坐在那硯料旁喝茶。他注視那塊硯的目光裡依然滿含着柔情。

屯溪老街上還有一塊絕世之硯，被稱爲「歙硯之最」。在萬粹樓一樓的「九百硯堂」內，展列硯台精品大小九百餘方，其中有一塊罕見的照壁硯，其長二米三八、重一點二五噸，硯名爲《文王魂》，由樓主萬仁輝與當今刻硯第一大師方見塵共同創意，並由方見塵精心設計雕製而成。中國歷史上的名君聖人周文王靜穆凝重的神情在硯石多變的石韻肌理的映襯下莊重而靈動。這方巨硯看似波濤洶湧，但手摸上去卻是極爲細膩、平滑，集中了歙硯的優良品質，據說是此私人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近年中，我發現江西婺源江灣鎮上有一條街，數百米長的街道兩旁，全是賣硯的小店舖。這條街上，戶戶採石製硯，簡陋的門面內，陳列着各式硯台，其中不乏精品。店主有的在店內雕刻硯石，有的在門前處理硯料。硯品的價格從幾百元到數萬元不等，但同等級硯品價格比屯溪老街上的要便宜許多。這個發現令我開心，於是，我再去屯溪老街看硯只是看個熱鬧，而去江灣卻是眞心淘寶。

眼下，內地開始流行硯石做成的茶海，因爲石頭具有硬度大，密度強，顏色天然，遇冷遇熱不變形，不開裂、不褪色，磨光後不會吸茶色等優點。另，石的天然紋理、質感等古樸簡潔、物趣天成，更具文化內涵及雅趣，是木製茶盤所不具備的，所以，硯石茶海在內地重情趣、講究品味的文人墨客中很受追捧，成爲一種時尚和文化。江灣便把製作硯石茶海作爲主打產品。



蟬形歙硯 陳 旻攝

歙硯珍品：茶海 陳 旻攝

山東大蔥

戴永夏

文化什錦

山東確實盛產大蔥。尤其濟南近郊的章丘大蔥，更是全國聞名。早在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明世宗就封它爲「蔥中之王」，從此便成爲貢品，年年向朝廷進貢。章丘大蔥作爲山東大蔥的代表，有「高、長、脆、甜」四大優點。高指大蔥的植株高大，單株最高可達二米，重一點五公斤；長指蔥白很長，可達零點五至一米；脆指質地脆嫩，無筋無渣；甜指口味甘甜，少有辛辣。章丘大蔥的這些優點，是其他地方的大蔥難以企及的。

大蔥作爲美食，首先在於生食。生大蔥蘸麵醬捲餅，是山東民間的常食，現已進入宴席。在山東各地的宴席上，經常會上一個堆滿生蔥白、鮮黃瓜的大盤，外加一碟甜麵醬。用鮮黃瓜、蔥白蘸麵醬生食，甜脆爽口，清香入心，那滋味遠在海參鮑魚之上，頗受歡迎。香港美食家蔡瀾說過：「請客時上此道菜，吃過之後無論哪一個國家的人，都拍案叫絕。」此外，大蔥蘸醬還是別的菜的配菜。如北京烤鴨、鍋燒肘子、清炸大腸等名菜，若沒有山東大蔥相配，便會「香銷玉殞」，黯然失色。當然，大蔥的功用和價值，更多地體現在熟食上。就自成體系的魯菜來說，無論是爆炒燒溜，還是蒸扒炸烤，都離不開大蔥。正如魯菜行話所云：「如言山東菜，菜菜不離蔥。」大蔥在魯菜之中既可做主料，又可做輔料，還可做調料。如蔥爆蹄筋、蔥爆魚唇、蔥爆羊肉等名菜，都以大蔥爲主料。而用蔥花、蔥油、蔥椒泥做調料，幾乎每道魯菜必不可少。至於大名鼎鼎、馳譽中外的北京全聚德烤鴨，非用山東大蔥做輔料不可。少了大蔥，其味不正，其香不純，品質也大打折扣。

一九三一年，作家老舍剛到濟南不久，就把生吃大蔥看作是一件「好事兒」加以提倡。他在《到了濟南》一文中說：「濟南有許多好的事兒，隨便說幾種吧：蔥好，這是公認的吧，不是我造謠生事。」接着他以山東人患肺結核死的人少於其他省爲例，認爲這「確是因爲口中的蔥味使肺病菌倒退四十里」，並鼓勵大家親口去嘗嘗生大蔥的味道。

上世紀三十年代曾在青島生活過的著名文學家兼美食家的梁實秋，晚年在台灣十分懷念山東的美食，又特別鍾情山東大蔥。他在《憶青島》一文中深情回憶說：「……再就是附近濰縣的大蔥，粗壯如甘蔗，細嫩多汁。一日，有客從遠道來，止於寒舍，惟索烙餅大蔥，他非所欲。乃如命以大蔥進，切成段段，如甘蔗狀，堆滿大大一盤。客食之盡，謂乃平生未有之滿足。」

相比較而言，毛澤東對山東大蔥的態度，最堪稱道。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到山東視察，在專列上請地方官員吃飯。當服務員端上一盤大蔥和麵醬時，一向沒有生吃大蔥習慣的毛卻能入境隨俗，風趣地說：「你們山東人不是愛吃大蔥嗎？來，大家都吃。」說着便拿起一根生大蔥，帶頭吃了起來……毛澤東對大蔥的「器重」，還表現在他用大蔥搞外交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親赴莫斯科跟蘇聯領導人會談，同時參加斯大林七十歲壽辰慶祝活動。他給斯大林帶去兩車皮祝壽禮物，一車皮江西的蜜橘，另一車皮就是山東大蔥。毛的眞正用意，一是他很看重山東大蔥的美味價值，想以此給缺少「大蔥體驗」的蘇聯領導人一個驚喜；另一方面，他深諳蔥的「調和」習性（《本草綱目》中稱蔥爲「和事草」），送蔥寄託着他希望中蘇消除隔閡、團結合作的心願。

誠如當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閻明復所言：「共產國際時代蘇聯做了很多工作幫助中共建黨，但在斯大林時代也做了很多對中國革命不利的事情，如把王明路線強加於我們等等。雙方之間，用毛主席的話來講，就是總是有一肚子氣。那麼，主席是想用大蔥這個方式來消氣了。」

告別芭蕾舞台

姚船

名居人語

芭蕾舞，在西方社會一貫被視爲最高雅的舞蹈藝術。想在該舞台佔一席之地並非易事，更何況是少數族裔有色人種，要展露身姿可謂難上加難。

但華裔舞蹈家吳振紅卻是異數，她在一九八八年考進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劇團，憑藉自己的才華和刻苦訓練，從一個普通演員晉升爲首席女舞蹈員。多年來，她主演的經典劇目如《天鵝湖》、《睡美人》等，都深獲好評。她以優美舞姿和深厚感情演繹的角色令人讚嘆不已。她神奇的足尖像一個個跳躍的音符，譜寫了一曲美妙的藝術樂章，也爲華人社區增添了不少光彩。

不久前，四十歲的吳振紅宣布退休，告別爲之付出整個青春的芭蕾舞台。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劇團在五月底爲她舉行隆重告別演出，劇目就是她十分喜愛的《吉賽爾》。吳振紅說，她感到沒有什麼遺憾，因爲「心目中想跳的芭蕾舞都跳過」。一個人，經過長時間不懈的努力，終於完成了心願，實現夢寐以求的理想，那份滿足和快樂，是很難用簡單筆墨形容的。

記得十幾年前，當我在報章看到吳振紅擔綱演出芭蕾舞劇《睡美人》的消息時，十分好奇，一個華裔姑娘，眞的是加拿大國家芭蕾舞劇團的台柱嗎？結果，吳振紅用優美、輕盈的舞姿，把晨曦公主演活了，那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顯示她把在場的所有族裔觀衆征服了。

一個出生在中國，八歲才隨父母移居加拿大的女孩子，能在異國他鄉實現自己的夢想，是多麼難能可貴！多年來，不少華裔藝術家和極有潛質的青少年，來加拿大後，由於語言、文化差異和環境因素等的影響，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多數人不得不放棄自己心愛的藝術，有的縱然頑強堅持下去，能成功者也是鳳毛麟角。異國他鄉的藝術之路，往往是一條更加艱難曲折的辛酸路。

吳振紅可說是移民中一個集天才、勤奮和幸運相結合的典型。近年來，她也努力走進華人社區。她那高挑的身材，有着一雙圓圓大眼睛的笑臉時常在社區慈善籌款晚會上出現。對於吳振紅，華人已不再感到她只如純潔高貴的白天鵝般那樣難以接近，她從高雅的芭蕾舞台上走下來，也是一個扎扎實實的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

據說吳振紅從芭蕾舞劇團退休後，會到父母親開辦的芭蕾舞學校任教。不管選擇什麼工作，相信都和芭蕾舞有關，因爲她已和芭蕾舞結下不解之緣。

但願她在人生的大舞台上，能「跳」得更加精彩。

少林武僧與抗倭戰爭

黃 元

文史叢譚

明代把少林寺、五台山、伏牛山三個寺院的武僧，正式編列爲國家「鄉兵」，稱爲「僧兵」，相當於現代的「預備役」軍人；尤其是少林僧兵，深度介入現實社會生活，頻繁接受國家徵調，參加打仗：平定叛亂、鎮守邊疆和抗擊倭寇。

少林寺，「地從梁魏標靈異，僧自隋唐好武名」（明・傅梅《少林寺》）。僧人以慈悲爲懷，信奉「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但爲了保衛國家，他們「談玄更演武，禮佛愛論兵」。其實，「僧」與「兵」並不矛盾：僧兵所殺是「魔」一般的敵人，佛界護法天王亦以「金剛杵」、「降魔杵」誅殺惡魔；僧兵四處征戰，正是禪門的「正果」和「傳燈」，所謂「定亂策勳眞證果，保邦靖世即傳燈」（明・程紹《少林觀武》）。

少林僧兵，「便捷驍勇，官兵臨陣，用爲前鋒」。其功夫以拳法、棍法爲主，尤以少林棍法最爲馳名，有「少林尚棍」之說。《少林十誡》謂少林寺僧與俗家子弟習武，「僅可用於自衛」。棍爲鈍器，且係木質，殺傷力遠遜於刀劍等金屬利器，符合有限地運用武術的佛門弟子的身份。在十八般兵器中，棍術被認爲是藝中魁首，是練習一切兵器的基礎：「諸藝宗於棍。」

嵩山著名少林和尚周友，「其性惟勇」，「自幼習武，精究六韜」，「名播四海」。少林寺塔群中有一座塔，上題「天下對手，教會武僧」，即是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爲他所立。他多次「蒙欽取徵調」，參加過北方戍邊、征討土匪、平定苗亂等戰鬥。最多時帶僧兵五百人，立過三次奇功（明代分軍功爲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封「都提調總兵」，人稱「三奇和尚」。

武僧的精湛武藝，是長期練武積累和獲得的。晚明詩人公鼐《少林觀僧比試歌》展現了三百七十多年前少林寺千餘武僧清晨練武的壯觀場面：「震旦叢林首嵩少，比丘千餘盡英妙。」詩人讚揚他們「袒裼攘臂」、「抗聲鼓銳」的英雄氣概，和有虛有實、剛柔相濟、佯攻實退、似退卻進的戰略戰術。

十六世紀明朝的一項重要國策，是抗擊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政府軍在這方面少有作爲。有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日本海盜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他們在浙江登陸後，經淳安進入安徽歙縣，直逼蕪湖，然後在南京城外兜了個大圈子，過宣興退至武進，一路殺傷四千多人。明朝陪都南京城內駐軍十二萬，竟讓一小股敵人過關奪隘如入無人之境。這不能不說是明軍的奇恥大辱！

而其時少林武僧挺身而出，戰鬥在平倭抗侮的第一線，戰績卓著、威震天下。少林武功演化成了匡扶正義的文化符號，武僧們的神奇功夫與壯烈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

倭寇雙刀光耀奪目，刀法奇詐詭秘，「上下四方盡白，不見其人」，但在少林僧兵面前，卻無所施其技了——僧兵「俱持鐵棍，長七尺，重三十斤，運轉便捷如竹杖」（《吳淞甲乙倭變誌》），他們「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爲神兵，膽已唬落」（《江南經略・僧兵首捷記》）。

少林僧兵戰果輝煌——「天員一戰於翁家港，再戰於白沙灘，倭賊二百五十餘人，斬刈無遺。」（《江南經略・勒功三誓》）「山東應募少林僧，葉榭江灣敵隊乘。七尺棍長卅斤重，戰場陷陣勇登先。」（《上海縣竹枝詞》）

明・莫是龍《雲間雜誌》描寫帶兵僧人月空和尚的沉着機智、英勇善戰，筆墨精煉、生動傳神：「一賊舞刀而來，月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碎賊首，於是諸賊氣沮。」動作乾淨利索，禪武味道極濃。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少林僧兵》極讚少林僧兵爲國戰死疆場的壯烈：「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捍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也有的說戰死者僅四人：曰徹堂，曰一峰，曰眞元，曰了心。松江知府方康爲悼念四位僧人的義勇，於離上海二十里的佘山建「四義僧塔」；松江華亭人、以直言敢諫著稱的「四鐵（口、膝、膽、骨）御史」馮恩，爲之撰塔銘。今已圮。